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后期资助课题成果文库

视觉隐喻

Shijue Yinyu

——拉康主体理论与电影凝视研究

曾 胜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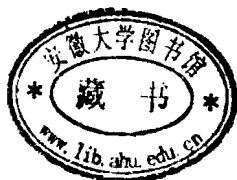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后期资助课题成果文库

视觉隐喻

Shijue Yinyu

——拉康主体理论与电影凝视研究

曾 胜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视觉隐喻：拉康主体理论与电影凝视研究 / 曾胜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11

ISBN 978 - 7 - 5161 - 1645 - 6

I. ①视… II. ①曾… III. ①拉康, M. L. (1901—1981) - 哲学思想 - 研究②电影 - 视觉 - 隐喻 - 研究 IV. ①B565. 59
②J9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51248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宫京蕾
特约编辑 大 乔
责任校对 秦 艳
责任印制 李 建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 //www. csspw. cn](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2. 75
插 页 2
字 数 213 千字
定 价 38. 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导论 拉康主体理论概述	(1)
第一节 “回到弗洛伊德”	(1)
一 无意识：弗洛伊德的天才发现	(1)
二 结构语言学：拉康对弗洛伊德的超越	(3)
第二节 拉康主体理论的思想渊源	(8)
一 达利的“妄想狂批评”	(8)
二 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	(11)
三 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	(15)
四 黑格尔的欲望哲学与主奴辩证法	(20)
第三节 主体三界说——拉康哲学的理论核心	(24)
一 主体的命运	(25)
二 主体三界说	(27)
第四节 凝视——拉康主体理论与电影文化研究的契合点	(33)
第一章 想象界——主体的镜像	(41)
第一节 作为镜像阶段的影像认同	(41)
一 认同问题	(41)
二 视觉认同	(46)
三 小他者：影像认同的对象	(50)
第二节 身体与空间的哲学话语	(53)
一 空间认同与主体建构	(54)
二 身体认同与主体建构	(60)
第三节 影像中的身体—空间认同	(68)
一 电影理论中的身体—空间话语	(69)
二 “性面具”：女性主体的隐喻	(74)

三 “大视觉”：文化主体的隐喻	(79)
第二章 象征界——主体的异化	(87)
第一节 无意识是他者的话语	(88)
一 大写的他者	(88)
二 无意识具有语言的结构	(90)
三 欲望是他者的欲望	(94)
第二节 电影语言结构与无意识主体	(97)
一 焦虑现实中的主体	(100)
二 欲望凝视中的主体	(120)
第三节 仪式思维与反结构隐喻	(137)
一 结构与反结构：电影隐喻的悖论	(138)
二 “强力时刻”：反结构隐喻的影像表征	(141)
第三章 实在界——主体的征兆	(146)
第一节 “拉康—齐泽克理论”	(146)
一 拉康对实在界的论述	(146)
二 几个概念：齐泽克对实在界的诠释	(150)
第二节 齐泽克的拉康主义电影研究	(171)
一 从征兆到征兆合成人	(172)
二 作为征兆的凝视	(174)
三 征兆合成人的叙事策略	(176)
四 征兆合成人的文化意义	(179)
第三节 体验与阐释——作为主体征兆的身体隐喻	(181)
一 道德伦理的悲情言说	(182)
二 欲望影像的炫耀性消费	(184)
三 现代性时空压缩的颓废体验	(186)
结语 电影：人之主体的视觉隐喻	(189)
参考文献	(193)

导 论

拉康主体理论概述

第一节 “回到弗洛伊德”

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1901—1981），20世纪继弗洛伊德之后最著名的精神分析理论大师。尽管与弗洛伊德并无交往，但拉康却尊称弗洛伊德为自己的理论之父，甚至再三强调自己的理论就是为了“回到弗洛伊德”。当然，拉康所谓的“回归”并非照搬弗洛伊德的理论衣钵，而是为了在弗洛伊德庞大严密的精神分析理论体系中寻找可供解构的裂隙，从而为自己新的精神分析理论谋求话语权。因此，拉康所谓的“回到弗洛伊德”，其实就是一次对传统精神分析理论蓄谋已久的“弑父”行为，正如拉康所说：“如果精神分析学要成为一门科学——它现在还不是，如果它不想在技术方面蜕化下去——说不定它已经蜕化了，我们就要重新寻出我们经验的意义。如果要达到这个目的，最好的做法是回到弗洛伊德的著作去。”^①

一 无意识^②：弗洛伊德的天才发现

弗洛伊德对自己的精神分析学说一向颇为自负，认为自己提出了两个“触怒全世界”的假设，因为它们严重冒犯了人们心中理性和道德的权威：其一，心理过程自身是无意识（也可译为“潜意识”）的，而意识在整个心理生活中只占极少的部分；其二，所有神经性疾病和心理疾病的重要起因是性本能冲动。的确，即便是在21世纪的今天，弗洛伊德的这两

^① [法] 拉康：《拉康选集》，褚孝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77页。

^② 弗洛伊德的unconscious主要有两种流行的译法，即“潜意识”和“无意识”，但二者几无区别，可以互换，本书为行文方便，统一译为“无意识”。

大精神分析创见也还是令不少人难以理喻，更不用说是在 19 世纪 80 年代——精神分析心理学创始阶段——那样一个维多利亚文化时代，彼时人们不但在思想上遭受宗教文化的禁锢，被迫压抑自己内心的欲望，反对一切享乐和肉体快感，而且整个欧洲的政治和经济也危机四伏，整个社会都弥漫着一种令人窒息的绝望氛围，患有精神疾病的人日益增多。弗洛伊德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登台亮相的，世人对其学说爱恨交加，因为它既击中了人们精神世界的伤痛，又给人们带来了心理治疗的希望。

何谓无意识？“无论何种心理过程，我们若根据其产生的影响而不得不假定其存在，但同时又无从直接觉察到，我们就把这种心理过程叫做‘无意识的’。”^① 弗洛伊德认为人的心理由意识、前意识和无意识三部分组成，在意识的表象之下有一个复杂而隐秘的无意识世界，此即弗洛伊德的“深蕴心理学”（depth-psychology）。弗洛伊德最初从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失误动作，如口误、读误、听误、笔误、遗忘等入手研究神经症并逐步发现了无意识，他发现这些失误动作既非疾病现象，也非随意发生之举，而是一种有意义的心理活动，透过它们可以隐约找到人们内心某些被压抑的真实意图。稍后，弗洛伊德又将梦这种更为常见的日常现象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对梦的解析，他发现梦有显意和隐意之分，隐意往往就是人们平时所压抑的欲望，而显意不过是对这些欲望的一种曲折而隐晦的替代性表达罢了，所以，弗洛伊德断定梦并非一种躯体现象，而主要是一种心理现象，是无意识的一种表征。

无意识为何受到压抑而不能转化为意识？弗洛伊德认为这与人的心理人格结构有关，他紧接着提出了“人格三部结构”理论，将人的心理人格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层次。其中，本我犹如“一口充满了沸腾着的兴奋剂的大锅”，聚集了来自遗传的本能能量，它缺乏理性和组织，只遵循快乐原则（pleasure principle）行事以满足本能的欲望。自我是本我和外部世界的中介，它具有满足、控制和延缓本能欲望的功能，遵循着现实原则（reality principle），如果说本我意味着桀骜不驯的激情，那么自我则代表着理性和审慎。最后，超我代表“良心”、理想和一切社会权威，是人类生活最高层面的东西，它遵循着道德原则（moral principle），

^① [奥] S. 弗洛伊德：《弗洛伊德文集》第 3 卷，车文博主编，长春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543 页。

用最严格的道德标准要求自我，因此与自我存在一种紧张的关系。因此，自我就像一个可怜的仆人，必须同时伺候三个严厉的主人——外部世界、本我和超我，并让它们之间保持和谐，自我常常因为难以忍受这种压力而产生焦虑——“有关外部世界的现实性焦虑、有关超我的道德性焦虑和有关本我中激情力量的神经性焦虑”^①。弗洛伊德尤其关注人的性本能（力比多）欲望，认为性本能是人之生命的基本要求、原始冲动和根本驱动力，但由于其依循的快乐原则总是受到来自现实原则和道德原则的双重阻挠和约束，所以性本能的欲望永远难以满足而不得不长期处于一种被压抑的状态。因此，弗洛伊德认为对性本能的压抑是人的无意识产生的根源和神经症的主要病因，但弗洛伊德同时也强调了性压抑对人类文明的作用，认为性压抑经过升华可以成为人类文化和艺术发展的主要动力。

弗洛伊德认为自己的精神分析学说可以和哥白尼的日心说与达尔文的进化论相提并论：“精神分析拥有一种特权，可在这一方面为科学的宇宙观辩护，因为人们无法指责它在宇宙图景中忽略了心灵事物。它对科学的贡献，恰恰在于把研究伸向了心灵领域。附带说一句，没有这样的心理学，科学就不会完整。”^② 确实，尽管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具有强烈的泛性论和神秘主义色彩，但它极大地动摇了理性意识在人的心理生活中的中心地位，使人的主体性受到前所未有的怀疑和挑战。

弗洛伊德去世之后，精神分析运动大致沿着内外两个方向发展，内部方向是指荣格、阿德勒、安娜·埃里克森、克莱因和科赫特等人，将精神分析演化为自我心理学、客体关系学、认同与自体心理学等学派；外部方向则是指霍妮、弗洛姆、罗洛·梅、赖希、马尔库塞和拉康等精神分析学家从医学、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哲学、语言学等学科中吸取营养，从而形成精神分析的社会文化学派、马克思主义学派、存在主义学派和后结构主义学派等。内外两个方向的精神分析运动延续百年，是20世纪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思潮。

二 结构语言学：拉康对弗洛伊德的超越

无意识和性本能作为弗洛伊德的两大假设，同时也是其理论的两大模

① [奥] S. 弗洛伊德：《弗洛伊德文集》第3卷，车文博主编，长春出版社1998年版，第550页。

② 同上书，第624页。

型或结构的关键词，即第一模型/人的心理结构（意识—前意识—无意识）和第二模型/人格结构（本我—自我—超我）。然而，在这两大模型或结构之间，实际上包含着一种思想的转变：弗洛伊德已将自己的研究重心从无意识转入到了自我，“弗洛伊德一直以分析‘伊底’（即本我）作为理论的起点，但其在后期开始注重对‘自我’的研究，其实，已预示着精神分析自我心理学的萌生”^①。由于自我一仆三主的困境常常导致主体产生焦虑和神经症，所以弗洛伊德对自我格外重视，他于1914年开始创立“自我心理学”（ego-psychology），后经其女儿安娜的努力又不断得以深化。自我心理学特别重视自我，把分析自我作为解决所有精神分析问题的起点，从而确立了自我在精神分析研究中的地位。弗洛伊德的“自我心理学”主张以增强患者的自我意识为精神分析治疗的目的，使自我能够更独立于超我，同时通过不断拓宽自我的知觉领域，扩大自我的组织，将无意识改造成意识，使自我取代或控制本我，最后减轻压抑，使神经症状得以消除。总之，弗洛伊德的自我心理学强调自我的主体地位，力求通过自我对本我——原始本能冲动的控制，最后使人能够回到成熟和理性中来，从而享受自由自在的精神生活，“哪里有本我，哪里就有自我，这是一种矫正性工作”^②。由此可见，弗洛伊德对无意识的发现，并非为了否定意识和主体，相反，无意识只不过是主体新找的一个栖身之地罢了，所以弗洛伊德如此看重自我在人格结构中所产生的作用，主张将无意识改造成意识，从而使自我成为无意识的主体。然而，自我一旦成为无意识的中心和主体，也就意味着把无意识实在化了，这不但有违于弗洛伊德对无意识的初衷，而且也极大地妨碍了弗洛伊德在无意识理论中对人之主体性作进一步的批判，所以，令弗洛伊德及其追随者颇为自得的自我心理学，遭到包括拉康在内的众多思想家的严厉批判。

《超越“现实原则”》一文是拉康对弗洛伊德《超越快乐原则》的“戏仿”之作，但却明确表示了拉康对传统精神分析的不满，同时也表达了他在“研究中的深思熟虑”基础之上对弗洛伊德的超越。拉康认为：“新的心理学不仅承认精神分析学有存在的权利；它还证明精神分析学具

① 蔡飞：《自身心理学——科赫特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总序，第6页。

② [奥] S. 弗洛伊德：《弗洛伊德文集》第3卷，第552页。

有开辟新径的价值，因为在源出他处的别的学科的发展史中常有与精神分析学不谋而合的时候。”^①此话清晰地表达了拉康运用新的理论来改造弗洛伊德学说的雄心壮志。在该文“精神分析经验的现象学描写”一节中，拉康进一步指出，由于精神分析主要是通过对话者之间的语言媒介进行运作，所以必须高度重视对语言的研究，因为“这个经验的素材首先是语言。一种语言，也就是说，一个符号。当心理学家在认识这个题目下，也就是说在主体的思想这个题目下引入语言时，语言指称带来的问题是多么的复杂”^②。另外，在《精神分析学中的言语和语言的作用和领域》一文中，拉康更是批评了传统精神分析学对语言的漠视：“年复一年，我们一直可以看到对于言语的功能和语言的领域的兴趣的这种反感。这个反感导致了我们的学术运动中公开承认的‘目标和技术的转变’”^③，而“毫无疑问，这些后果只有靠回到对语言功能的研究来纠正。在这种研究中精神分析学家应该是高超的大师”^④。不难发现，拉康再三强调了将语言学引入精神分析的重要性以及自己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如果作者（指拉康本人）的报告也只是些初始的啼叫，至少他将以此为昭示而更新他的学科的基础。这个学科的基础正是建立在语言之上”^⑤。

拉康从弗洛伊德对梦、日常生活中的失误动作以及儿童的言行所作的一系列无意识分析中，发现语言实际上已经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中初露端倪，如弗洛伊德把梦的成分与其解释之间的固定关系称为一种“象征”关系，认为梦有一个句子的结构，并且有各种修辞手段，如省略、倒叙、重复、借喻、换喻、提喻和寓言等，并且认为在儿童的梦里出现的往往是这个书写的原生表意形态，而在成年人的梦里则以语言和象征的形式出现，“通过这些，弗洛伊德教会我们看出主体用以改塑他梦幻言谈的那些炫耀的或指示的，掩护的或说服的，反驳的或诱惑的等等的意图”^⑥。因此，拉康认为弗洛伊德已经认识到主体无意识与语言之间的密切联系以及象征符号在自我意识建构中的重要作用。这一点在弗洛伊德描述其孙子独

① [法] 拉康：《拉康选集》，褚孝泉译，上海三联书店 2001 年版，第 67 页。

② 同上书，第 77 页。

③ 同上书，第 250 页。

④ 同上书，第 252 页。

⑤ 同上书，第 246 页。

⑥ 同上书，第 278 页。

自游戏的一段文字中得到了证明：

但是这个行为表现很好的儿童偶然也会表现出令人讨厌的习惯，他把他所能拿到的一切小东西都扔到房屋角落里或床底下，这样，要把他的玩具收集起来就绝非易事了。与此相伴随，他表现出一种兴趣和满足，并发出大声的、长长的“O——O”声，在他母亲看来（和我自己的看法一致），这不是一种感叹声，而是说“走开”。我终于发现这是一种游戏，这个孩子用他所有的玩具只是玩“走开”的游戏。有一天我做了一次观察证实了我的观点。这个小男孩拿着一个缠着线的木线轴。他从未想到，例如，把线轴放到身后的地板上拖着，玩马拉车的游戏，而是相对熟练地抓着线的一头，不断地扔过他的小吊床的床沿，这样，线轴扔进吊床里不见了，然后他发出有意义的“O——O”声，对线轴的出现发出“Da”（出来了）的欢呼声。因此，这是个完整的游戏，是消失和再现，一般旁观者所观察到的唯一的动作是第一次动作，是儿童把它作为自己的游戏而不断重复的一个动作，虽然更大的快乐无疑在于第二个动作。^①

弗洛伊德因此认为，儿童可以把痛苦的经验转换为一种游戏来重复，也即通过“控制环境的冲动（权力本能）”来扮演一个“主动的角色”并从中获得满足。这种解读当然是符合弗洛伊德后期所强调的自我意识理论的，然而，拉康却从这个似乎简单而有趣的情境当中看到了结构语言学的影子——在主体心理和符号结构之间蕴含着一种密切的关系：“线轴”代表儿童的母亲，在线轴的消失（“O——O”）和线轴的出现（“Da”）过程中，一种象征关系和幻想活动被建构起来，这种幻想就是儿童的无意识。儿童之所以能够在幻想中得到满足，是因为儿童通过象征符号使自己成为语言化的主体，在幻想的无意识中通过符号能指弥补了作为符号所指的母亲——欲望的“缺场”。这种满足显然是一种虚假的满足，它表明儿童无意识中的“强大”主体实际上是一种通过象征符号建构起来的虚幻主体，是象征符号的产物。因此，拉康高度评价了弗洛伊德在无意识理论中对“语言”的运用：“以一种天才的直觉，弗洛伊德将那些遮掩游戏

① [奥] S. 弗洛伊德：《弗洛伊德文集》第4卷，车文博主编，第10页。

(指上述游戏)指给我们看,为的是让我们看到,欲望人文化的时刻也就是幼儿达到语言的时刻。”^①在拉康看来,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不仅深刻地揭示了人之岌岌可危的主体性命运,而且还天才般地预示了无意识具有语言的结构,可惜,弗洛伊德及其自我心理学派却将这个几乎呼之欲出的理论发现弃置不顾,反而一头钻进了自我主体的泥潭,使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中最具思想活力的“无意识”观点顿时“黯然失色”。因此,拉康认为新的精神分析学说应该“转向语言的领域,只有按言语的功能来组织,这些概念才具有其完整的意义”^②,而重新阅读弗洛伊德的著作将是回归弗洛伊德的不二法门,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重新发掘大师著作中被掩盖的意义。

包括语言文字在内的一切象征符号都是社会文化的载体,蕴含着价值判断的普遍标准,而这种象征符号的结构就如同一张无形之网,将所有人 and 一切事物都纳入其中,当主体以为自己正在享受自己的欲望快感时,殊不知这一先有的、外在的和体现社会文化价值普遍标准的无形之网已经迅速将人的真实欲望过滤殆尽,因此,在遭受语言象征符号的异化之后,人之主体的欲望实际上只是他者的欲望。“……那儿(Fort)!这儿(Da)!正是在其孤独中幼儿的欲望成了别人的欲望,成了控制他的另一自我的欲望,其欲望的对象从此成了他的痛苦”^③。

由于弗洛伊德当时还没有机会运用结构语言学的方法,他只能将精神分析放在生物学的框架中进行所谓的精神世界的“科学化”研究,因而扼杀了其理论中最具原创性的无意识概念,从而未能在精神分析的发展中取得更大的贡献,所以“在拉康看来,要理解弗洛伊德的真正意义,只有依据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费尔迪南·德·索绪尔的语言学、罗曼·雅各布森的当代(拉康同时代)语言学和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④。由此可见,拉康所谓“回到弗洛伊德”,实际上就是要回到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中去,回到对主体问题的结构语言学思考当中去。如果说弗洛伊德对无意识的天才发现,无意中戳破了人的理性主体的面纱,暴

① [法]拉康:《拉康选集》,褚孝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33页。

② 同上书,第255页。

③ 同上书,第333页。

④ Stephen A. Mitchell and Margaret J. Black: *Freud and Beyond: A History of Modern Psychoanalytic Thought*. The commercial Press. p. 227.

露了人的无意识存在，那么，拉康则更进一步，通过对无意识的结构语言学分析，不但否认了意识，进而连无意识也彻底弃除了，因为无意识不但具有语言的结构，而且无意识还是他者的话语，所以无意识蕴含的只能是他者的意识和欲望，与主体自身毫无关系。所以在拉康眼中，弗洛伊德的所谓无意识主体仍然是个彻头彻尾的伪主体。主体何在？拉康的回答令人绝望：主体已死！

第二节 拉康主体理论的思想渊源

一 达利的“妄想狂批评”

西方现代艺术的最大特点就是追求对非理性和幻想的表现，这在 20 世纪 20—40 年代的超现实主义（Surrealism）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超现实主义坚信非理性和无意识的存在，推崇以心理自动主义（Automatism）来调和现实与梦幻之间的冲突。安德烈·布列东在《超现实主义宣言》中就宣称超现实主义是一种“纯粹的精神自动主义”，它不受理性的任何控制，也不依赖于任何美学或道德的偏见，而是“建筑在对于一向被忽略的某种联想形式的超现实的信仰上，建筑在对于梦幻的无限力量的信仰上，和对于为思想而思想的作用的信仰上。它肯定要摧毁其他的精神机械主义，同时代替机械主义来解决生活的主要问题”^①。显然，超现实主义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特别是精神分析临床实践中的“自由联想法”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都认为只有通过直觉才能进入并表现人的生命本真状态——非理性的无意识世界。

西班牙画家萨尔瓦多·达利，就是 20 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一位超现实主义画家。和弗洛伊德一样，达利有一个性情严厉的父亲——一位律师兼公证人，而达利的母亲则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在达利出生前的九个月，达利有一个两岁的哥哥不幸夭折，而萨尔瓦多·达利正是这位不幸夭折的男孩的名字，它被日后的天才画家达利所继承。也正因为这个原因，达利一直受到母亲的溺爱。然而，达利在承受母亲因缺失心理而产生的补偿之爱的同时，也不得不一直生活在亡兄的阴影中，因此达利内心充满了

^① 吴永强：《外国美术史》，海南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22 页。

对同名哥哥的嫉恨，甚至在成年后都因为难以走出这种“悲剧性”心理结构而不得不接受心理治疗，认为“一种精神分析学揭示了我那悲剧性的结构基础上的巨大矛盾：在我内心深处，我那死去的兄弟不可避免地存在。我的父母非常喜欢他，当我出生时，我的父母给我取了他的名，萨尔瓦多。……我时常整个身心处于一种完全衰败的境地来描绘我理想中的兄弟。只有想到自己的死，接受躺在棺材里的念头时，我才能使自己睡着。……一个出自内心的经历正确地判断我的存在的精神结构。”^①在达利7岁时，他又被父亲强行送入一所贫民子弟学校就读，父亲的初衷是想让年幼任性的达利体验一下世态炎凉和生活挫折，从而变得理性一些，孰料养尊处优的达利非但不能适应这种环境，心理上的优越感和生活上的差异反而使他倍感压抑和孤独。童年时期的这些痛苦经历促使达利形成一种敏感、多变和叛逆的矛盾性格，从而过早地转向了自我内省与沉思，并养成了对自我意识的一种近乎疯狂的追求。纵观达利一生，我们可以发现各种各样的野心和欲望将其深深缠绕，他是那样贪恋金钱与声望，渴望永远生活在世人关注的焦点之中，以至达利经常以拿破仑和毕加索等人自居，难以区分现实与想象的距离，这也是达利狂妄自大性格的突出表现。

达利狂妄自大的性格促使其产生一种“妄想狂批评”（paranoiac critical）的超现实主义艺术理念。所谓妄想狂批评，即“一种无理性知识的自发性方法，是以精神错乱现象的解释和批评联想为基础的”^②。达利对怪异、恐怖和丑陋的事物及其不合情理的变形组合特别感兴趣，认为只有这些非常见之物才能彻底表现人的无意识心理世界，所以，达利笔下的物体描绘精致、浮华优美、毫不相干又充满暗示性，其特有的恋物癖、色情虐待狂和受虐狂等病态性心理在其作品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达利画作尽管画幅不大，但偏爱表现无边无际、深不可测的梦幻空间，仿佛要把人推入一个由性、死亡、暴力和现代文明所构成的“漂浮”、“无限”的恐惧之中。达利画作中的意境是荒诞不经的，但其具体物象又是高度写实的，这就使观者同时被现实与非现实、理性与非理性所拉扯，很容易体察到画家狂躁不安的人格分裂。这种梦幻般的无意识在达利的代表作《记忆的永恒》、《蜜比血甜》和《内战的预兆》等作品中表现得尤为鲜明，当

① [西] 萨尔瓦多·达利：《达利谈话录》，江苏美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29页。

② 吴永强：《外国美术史》，海南出版社2005年版，第325页。

然，画中各种充满象征意味的符号无疑也增加了观者诠释其作品的难度。

达利的天赋与疯狂同在，除了绘画，他还热衷于雕塑、设计、演讲、写作和电影创作，尤其是他的超现实主义电影艺术实践，在世界电影史上同样产生了重大影响。达利很早就认识到电影与绘画在表现方法上的差异，认为电影可以表现出绘画无力表现的意象。20世纪30年代，达利先后与布努艾尔和希区柯克等著名电影导演合作，创作拍摄了《一条安达卢西亚狗》、《黄金时代》和《蛊惑》等实验性影片并获得空前成功。在这些影片中，达利同样运用了他的“心理自动主义”和妄想狂批评方法，试图将观众带入一个由梦幻、命运和想象构成的激流中，而观众只有完全摒弃日常的习惯性思维模式才有可能进入这一由死亡、色情和腐败构成的影像迷宫，才有可能体到达利在表现和批判人类精神世界时的良苦用心：生与死的矛盾、理性与感性的碰撞、心理上的迷恋与生理上的厌恶。达利多次表达了自己对人类文明压抑人之本能欲望的反感：“我和疯子的最大不同就是，我没有疯”^①、“我饱受万物的影响，但却无物能改变我”^②、“我爱慕自我宣传，因为我的作品主要都是‘自我’，重要的是我创造了‘达利’”^③。由此可见，达利这位以狂者自居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家，是企图以一种怪诞疯癫的“无意识”生存状态和艺术实践来追寻人的本真意义。

然而，达利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狂热推崇以及在艺术实践中的大胆运用，并没有得到弗洛伊德本人的理解和认可。1938年，弗洛伊德对专程前来拜访自己的达利只作出如下评价：“你的艺术当中有什么使我感兴趣呢？不是无意识而是有意识。”^④这个评价或许表明达利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理解存有偏差，但不能否认达利的艺术成就，因为达利以其非凡的想象力和精确的表现技法为我们创造了一个人类的妄想狂世界，深刻讽刺了人类灵魂深处的虚妄与腐败。另外，达利的妄想狂批评对拉康的主体理论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两人曾于1937年在巴黎有过一次历史性的会面，达利是这样记录他和拉康的会谈的：“我刚接到一位最

① 刘燕编著：《达利画传》，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年版，第38页。

② 同上书，第46页。

③ 同上书，第52页。

④ 吴永强：《外国美术史》，海南出版社2005年版，第325页。

杰出的年轻精神分析医生的电话。他才在《米诺托》中读到关于‘妄想狂活动的各种内在机制’的论文，他向我表示祝贺，我对这样一个题目的正确科学认识（一般而言，这是极为罕见的）令他吃惊。……我一心想使我们初次交换意见这件事能正规地甚至有几分庄严地进行。……我们惊奇地发现，由于同样的原因，我们的观点与公认的构造主义论断是对立的。”^①由此可见，达利与拉康是惺惺相惜的，两人不但在“妄想狂”问题上有着共识，而且对当时流行的构造主义都持批评态度。不过，这并不奇怪，因为拉康的博士论文就以妄想狂为主要研究对象，而且这也是他于1936年提出的镜像阶段理论的心理基础。尽管达利所追求的那些亦真亦假的“疯狂”无意识，与拉康的体现“人之主体虚无”的无意识观仍存有本质的区别，甚至正是拉康所要否定的对象，因为“无意识是他者的意识”，但达利对人的压抑、颓废和残忍的混乱性存在的深刻观察和痛苦体验，以及在此基础之上建立的“妄想狂批评”，无疑对拉康的主体理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因为“拉康想对大多数当代人还晦暗不明的现象——妄想症——投下了一束科学之光，并赋予它以真实的意味”^②。

二 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

索绪尔认为语言作为一门科学，先后经历过语法学、语文学和比较语文学（比较语法）三个阶段，这些阶段都存在方法论上的缺陷和错误，不但没有解决语言学的一些基本问题，甚至连语言学完整的研究对象都未能确定。因此，索绪尔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在我们看来，要解决这一切困难只有一个办法：一开始就站在语言的阵地上，把它当作言语活动的其他一切表现的准则。”^③索绪尔先后区分了语言与言语、能指与所指、历时与共时等对立关系，从而开创了结构主义的语言学体系。

1. 语言与言语

索绪尔认为语言与言语活动不能混淆，因为语言是社会集团中每个人都必须遵守而不能改变的规约，是一个整体和一个分类的社会原则，也即

^① 转引自黄汉平《拉康与后现代文化批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页。

^② [英] 玛考尔特·波微：《拉康》，牛宏宝、陈喜贵译，昆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页。

^③ [瑞]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30页。

一种稳定的、清晰可见的社会符号系统，并且人们对待语言结构也从不需要什么深思熟虑，完全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相反，言语活动则是复杂多变的，它跨越物理、生理和心理多个领域，并同时具有个人和社会性质，所以难以成为一个稳定的统一体，是个人的意志和智能的行为，说话者必须依赖语言规则才能表达自己的思想。索绪尔将语言系统比作所有人都在使用的“词典”或国际象棋的“棋法”，而言语则像词典中的具体词汇或棋盘上的某个棋子，语言和言语互相依存，语言既是言语的工具，又是言语的产物，因为言语这种内部变化反过来会改变整个语言系统，由此，索绪尔再三强调自己的语言学是语言的语言学，而非言语的语言学。语言与言语的区分是索绪尔对语言学的巨大贡献，罗兰·巴特认为索绪尔语言和言语的二分法具有重要的革新意义，因为这样就可以从“多样性和杂多性”的语言中抽引出一种纯社会性的对象，从而终结语言的混乱性。罗兰·巴特这里所谓的“纯社会性对象”，是指“人们进行交流所必需的规约系统，它与组成其本身的记号的质料无关，这就是语言结构”^①，从此，人们可以在混乱的言语活动中发现稳定的语言结构体系，使语言学研究有了新的进展。索绪尔甚至还天才般地设想建构一门“符号学”：“研究社会生活中符号生命的科学；它将构成社会心理学的一部分，因而也是普通心理学的一部分……而语言学不过是这门一般科学的一部分，将来符号学发现的规律也可以应用于语言学，所以后者将属于全部人文事实中一个非常稳定的领域。”^②

2. 能指与所指

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联结的不是事物的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所以语言符号是一种两面的心理实体，其两个要素如同一张纸的两面，紧密相连而且彼此呼应。索绪尔将概念称为语言符号的所指，将音响称为语言符号的能指，并且指出语言符号的几个基本原则：其一，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这也就是说，语言符号是任意的，这一原则支配着整个语言的语言学。当然，语言符号的这种任意性，也并不意味着说话者可以对能指进行自由的选择，因为人们必须遵守约定俗成的语言符号，而不能对

① [法] 罗兰·巴特：《符号学原理》，李幼蒸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

② [瑞]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38页。